

愛日精廬藏書志

〔清〕張金吾 撰
馮惠民 整理

書目題跋叢書

中華書局

書目題跋叢書

愛日精廬藏書志

〔清〕張金吾撰
馮惠民整理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愛日精廬藏書志/(精)張金吾著;馮惠民整理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12.10

(書目題跋叢書)

ISBN 978-7-101-07587-8

I. 愛… II. ①張…②馮… III. 私人藏書-圖書
目錄-中國-清代 IV. Z842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182399 號

-
- 書 名 愛日精廬藏書志
著 者 [清]張金吾
整 理 者 馮惠民
叢 書 名 書目題跋叢書
責任編輯 李肇翔
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
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規 格 開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張 24¼ 插頁 2 字數 700 千字
印 數 1-3000 冊
國際書號 ISBN 978-7-101-07587-8
定 價 73.00 元
-

《書目題跋叢書》出版說明

書目題跋，是讀書的門徑，治學的津梁。

早在漢成帝時，劉向奉詔校經傳、諸子、詩賦，每一書成，“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”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，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，取名《別錄》。這裏所謂的“條其篇目”，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、考證異同的基礎上，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、次序；所謂的“撮其指意”，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。劉向所撰書錄，在內容上應該包括：書名篇目、文本鑒別、文字校勘、著者生平、著述原委、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，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。劉向死後，其子劉歆又在《別錄》的基礎上，“撮其指要，著為《七略》”，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此後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，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。在官修目錄、史志目錄之外，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。

南朝劉宋時，王儉依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之體，撰成《七志》。《七志》雖無解題或提要，却在每一書名之下，為撰著者作一小傳，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，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。梁阮孝緒的《七錄》則增撰了解題，繼承了劉向《別錄》的傳統，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。唐代的毋煗撰有《古今書錄》，其自序云“覽錄而知旨，觀目而悉詞”，可知，《古今書錄》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。

到宋代，官修《崇文總目》，不僅每類有小序，每書都有論說，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。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，而

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，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。尤袤的《遂初堂書目》，羅列版刻，兼載版本，為自來書目之創格。而流傳至今、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《郡齋讀書志》。晁公武曾接受井度（字憲孟）的大批贈書，加上自己的收藏，“躬自校讎，疏其大略”，撰成《郡齋讀書志》，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；稍後的陳振孫（號直齋）利用自己傳錄、積累的大量書籍，仿照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的體例，撰為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並首次以“書錄解題”名其書。晁氏《讀書志》、陳氏《書錄解題》是書目解題的傑作，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“雙壁”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價《書錄解題》說：“古書之不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偽，核其異同。亦考證之所必資，不可廢也。”（卷八五）

到了明代，隨着藏書、刻書事業的發展，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，如徐渤的《紅雨樓題跋》、毛晉的《隱湖題跋》，都是當時的名作；又如高儒（自號百川子），所撰《百川書志》，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。

入清以後，由於文禁森嚴，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，研究學問，私人藏書盛況空前，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。明末清初，錢曾的《讀書敏求記》，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、元精刻，記述其授受源流，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，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。稍後，黃丕烈的《百宋一廬書錄》和《藏書題識》，注重辨別刊刻年代，考訂刊刻粗精，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。瞿鏞的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每書必載其行款，陳其異同；楊紹和的《楹書隅錄》在考核同異，檢校得失的同時，又詳錄前人序跋，間附己意。周中孚號鄭堂，其《鄭堂讀書記》仿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體例，著錄圖書四千餘種，被譽為《四庫提要》的“續編”。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所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，把“宋、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”，逐一

著明版式，鈔錄序跋，對《四庫全書》不曾收入的圖書，則“略附解題”。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，撰成《皕宋樓藏書志》，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，“於明初人之罕見者”，亦“間錄一二”，陸氏“間有考識，則加‘案’字以別之”。上述諸書，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，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，其中，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，不僅查閱方便，而且史料價值很高。丁丙的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，既著錄明人著作，又留意鄉邦文獻，鑒賞、考證兼而有之。沈德壽的《抱經樓藏書志》則仿張、陸二氏而作，收錄範圍延至清代。繆荃孫的《藝風藏書記》、耿文光的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也都各有所長。所有這些，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。

此外，有些藏書家和學者，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，邊收集圖書，邊閱讀、研究，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，隨得隨記，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。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，邊讀邊記，日積月累，被整理成《開有益齋讀書志》，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，被稱爲“方駕晁、陳，殆有過之”。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，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，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，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，有的鑒定版本時代，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、作者行實，這些文字，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。

總之，書目題跋由來久遠，傳承有緒。書目題跋，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，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。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，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、相同的內容。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，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。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學問專長、不同的價值取向，因此，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、各有特色，各有其參考價值。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，書目題跋具有更廣的內容、更多的信息，更高

的參考價值，對讀者閱讀、研究古籍，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。一部好的書目題跋，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。而且，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、札記，也往往以“題跋”名書，如陸心源所撰《儀顧堂題跋》、《儀顧堂續跋》，潘祖蔭、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，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，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《絳雲樓題跋》，可見，“書目題跋”之稱，已被學者廣泛採用。

有鑒於此，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十輯，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，增編為《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》十九冊，雖說還不够完善，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。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，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，而已經收入叢刊的，也有個別遺漏，加之成套影印，卷帙較大，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，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《書目題跋叢書》。

這套《書目題跋叢書》與上述叢刊不同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、實用而又稀見的，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、批注本；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；以圖書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、碑傳題跋。在出版方式上，不採用影印形式，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，標點排印，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、工作者、愛好者，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。

我們希望，這套叢書的出版，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，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2012年10月

整 理 說 明

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三十六卷《續志》四卷，清張金吾撰。張金吾字慎旃，別號月霄，常熟（昭文）人。生于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，卒于道光九年（1829）。他出身于書香門第，其祖父張仁濟，建有照曠閣，後為張金吾讀書之所。張金吾自幼受業于著名學者黃廷鑾，攻讀經史^①。十六歲時，父母先後去世，由其季父張海鵬（字若雲，1755—1816）撫養。其父張光基有藏書處詒經堂，并熱心古書傳播。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中即著錄“先君子手抄本”《新唐書糾謬》、《東觀漢記》、《三輔黃圖》、《嘉定鎮江志》等多種。其季父張海鵬是嘉慶年間的著名藏書家，又是熱心刊刻圖書的專門家，他“一生拳拳于流傳古書，至老彌篤”，曾云：“藏書不如讀書，讀書不如刻書；讀書只以為己，刻書可以澤人，上以壽作者之精神，下以惠後來之沾溉，視區區成就一己之學業者，其道不更廣耶？”（見黃廷鑾《第六弦溪文鈔》卷四“朝議大夫張君行狀”）他對張金吾視如己出，“撫之如子”，為了讓張金吾得到很好的教養，專心學業，張海鵬還為張金吾料理家產，并時時勉勵他要“讀書敦業，無墜家聲”。

常熟是藏書盛行的文化之區，又是脉望館趙氏、絳雲樓錢氏、

^① 黃廷鑾，字琴六，號拙經逸叟，常熟（昭文）人，清代校勘學家，有《第六弦溪文鈔》行世。其道光乙酉年（1825）所撰《齊民要術跋》云：“余自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，而所最愜心者，惟《文房四譜》、《廣川畫跋》二書，皆從訛謬中力開真面，今得此書而三矣。衰年多病，炳燭餘光，矻矻于陳編爛簡中，作一老蠹魚，自笑又自慰也。”

汲古閣毛氏、述古堂錢氏以及馮舒馮班兄弟的故鄉。在家庭和環境的影響和熏陶下，張金吾十餘歲時就隨季父校刻《學津討原》和《太平御覽》等書，“鈎稽審覈，見者稱焉”。嘉慶十三年（1808），張金吾二十二歲時補為博士弟子員，因省試不中，即放棄舉業，專門搜書、校書、編書，“欲以撰述名世”。此後，他殫十二年之精力，廣泛搜集史書傳記、山經地志、金石之記、斷蝕之碣以及醫書、譜錄、雜家、小說等，纂輯《金文最》一百二十卷，成為蒼萃有金一代文章的巨編。清初，署名納蘭性德的《通志堂經解》搜羅宏富，堪稱大成，但宋、元以來諸家經說放失不少，於是張金吾出其家藏秘帙加上傳鈔得來的各本，計八十餘種，撰成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六卷，並以其父張光基的藏書處詒經堂命名，稱《詒經堂續經解》。此前說經之書蒼萃無遺，成為《通志堂經解》的續編（參見張金吾自撰年譜《言舊錄》）。

張金吾自嘉慶十六年（1812）二十五歲時起，便篤志收藏，並與同里好友陳揆（字子準，1780—1825）成為藏書二友。二人同好書、同聚書、同讀書，賞奇析疑，互通有無。不數年間，其藏書之富，便與陳氏相埒，成為吳中藏書家的後起之秀。張金吾特別強調讀書的重要性，認為藏書不是目的，讀書才是根本。人品的優劣，素質的高低，都與讀不讀書有關。他說：“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者無他，學不學之所致也。然致力於學者，必先讀書；欲讀書，必先藏書。藏書者，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。”他認為，如果僅僅是“藏書而不知讀書，猶弗藏也。讀書而不知研精覃思、隨性分析，成專門絕業，猶弗讀也。”（見本書張金吾《自序》）這些見解，即使在今天，仍有一定參考價值。

張金吾藏書是為了讀書，而且對自己的藏書，也從不自秘，而是“樂與人共，有叩必應”。他曾以廉價收得包希魯撰《說文解字補義》十二卷元刊本，該書既有很高的參考價值，又是包氏衆多著

述中僅存之本，所以張金吾如獲“奇珍瑰寶”，但是，他惠允他人借鈔，而不是奇貨可居，秘不視人，認為“若不公諸同好，廣為傳布，則雖寶如球璧，什襲而藏，于是書何裨，于予又何裨？予喜藏書，不能令子孫亦喜藏書。聚散無常，世守難必；即使能守，或童僕狼藉，或水火告災，一有不慎，遂成斷種，則予且為庖氏之罪人。予之不敢自秘，正予之寶愛是書也”（見本書卷七《說文解字補義》條）。把公諸同好，廣為傳布，視為寶愛藏書的具體體現，把“謬為愛護，秘不示人”，看作是很無聊的事情，這些見解實在是難能可貴的。

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張金吾三十二歲時，撰成《愛日精廬書目》二十卷。兩年以後，又略附“解題”，另為一編，成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四卷，由黃廷鑒作序。此後，隨着藏書的日益增多，到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又取所藏宋、元槧本及新舊鈔之為世罕見者，重新著錄，并附入大量原書序跋，編成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三十六卷，後又補編《續志》四卷。道光七年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四十卷全部刊成，張金吾時年四十一歲（參見《言舊錄》）。

這時，張金吾的季父張海鵬早已過世。由于張金吾不善治生，晚年家境中落，負債累累。張氏舊宅也已賣歸常熟翁氏。道光六年（1826）六月，張金吾藏書十萬六千卷，被迫債者傾囊倒篋，捆載而去。次年，張金吾夫人季景和抑鬱而逝^①。不久，張金吾觸景傷情，

① 莫伯驥《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》集部七，著錄《新編目蓮勸善戲文》明刊本，題“張月霄妻李靜芬舊藏”，并云該書書末有“景和”、“靜芬”二字白文章。又引孫原湘《張月霄妻李孺人傳》云：“孺人姓李，名景和，字靜芬。既孀月霄，琴鳴瑟應，雍雍如也。月霄連試不得志，自奮于古，慨然思為杜、鄭、馬、王之學，日購奇書讀之。遇宋刊元槧，不惜多方羅致，積書至八萬餘卷。孺人濡染既深，遂能別識。月霄每重價購得秘籍，必相對鑒賞。孺人知其難為繼也，從容進曰：‘蓄之富，何如讀之熟也？’其明識婉順如此。卒年四十。”按：月霄妻姓季，不姓李。《言舊錄》有季景和序。此處引文見孫原湘《天真閣集》，“李景和”亦作“季景和”。莫氏此條誤引。

也在窮愁鬱悶中去世，年僅四十三歲。張金吾一生，讀書勤奮，涉獵廣泛，著述頗豐。除了上述提及的各書之外，尚有《愛日精廬文稿》、《兩漢五經博士考》、《十七史引經考》、《白虎通注稿》、《廣釋名》等。

張金吾的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，是清代有影響、有特色的一部書目題跋。他認為，現存的書目題跋，以晁公武的《郡齋讀書志》和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為最善，除此兩家之外，只有錢曾的《讀書敏求記》“略述源流”，并深受好評。但是，錢氏對所錄書籍選擇不精，“若傳注之羽翼，經訓史籍之記載，朝章及有關學術政治之大者則寥寥數種”，而且半數是習見之書。有鑒于此，張金吾認為，“著錄貴乎秘，秘籍不盡可珍；槧本貴乎宋，宋槧不盡可寶”，只有“有關經史實學而世鮮傳本者”才是上品。于是，他特別強調對所錄圖籍的“審擇”，而“審擇”的標準就是“以有裨學術治道者為之斷”。這說明，張金吾與那些炫奇侈博的藏書家不同，他帶有更多的讀書人的特質。所以，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只取“宋、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”（見《自序》）。

由于張金吾“鍾于經籍”，又“兼愛宋、元人集”（黃廷鑒語，見《第六弦溪文鈔》卷二“藏書二友記”），所以，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所收經、史兩部較為完備，集部圖書則取“卓然可傳者，兼收并采”，其他門類只是擇要選錄。而且，張金吾所錄各書，以元代以前的鈔本、傳鈔本、影鈔本及名家校本為最多，這就顯得更加可貴。

據初步統計，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共著錄古籍 782 種，其中，經部 186 種，史部 181 種，子部 86 種，集部 309 種。就版本而言，含宋本 52 種，元本 104 種，明本 112 種，共 268 種；其餘 500 餘種則為影寫宋元明本及鈔本、傳鈔本、舊鈔本。在這些鈔本之中，又有元鈔本、明初鈔本、精鈔本及名人鈔校本近百種。如：毛晉、毛扆合校《白氏文集》七十一卷，毛晉、王興公合校《樂府詩集》一百卷，馮

舒據宋本手校《藝文類聚》一百卷、《水經注》四十卷，何焯據舊鈔本手校《後山先生集》三十卷，宋寶王手校《靜修集》二十卷等等都是名鈔名校中的上品。尤其是馮舒手校《水經注》，該書既據宋本傳錄，又以劉僉、謝兆申兩宋本校證，并根據不同的校本、不同的內容，分別用朱、黃、青、黑多種顏色和多種符號逐一標示，所以，陸心源稱之為“誠二百年前善本也”（見《儀顧堂續跋》卷八）。

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的具體體例是：先列書名、卷數，次記鏤版年代，校藏姓氏。如果是《四庫全書》未收之書，則仿照晁、陳兩家之先例，撰寫“解題”。如果是元代以前的各種鈔本，便仿照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之例，收錄有關序引、題識和跋語；但是，有刻本者不錄，見于本人專集者不錄，經部見于《經義考》、《小學考》者不錄，唐文見于《全唐文》者不錄（見本書《例言》）。可見，張金吾對所錄序跋的選擇，也是有嚴格標準的。

在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中，張氏自撰“解題”305篇，所收前人序引、題識和跋語千餘篇。既有自撰“解題”，又大量收錄前人序引、題識和跋語，是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不同于其他書目題跋的地方，也是該書的突出特點和優點。這些文字，不僅對了解一書的刊刻年代，版式特徵，版本優劣，內容完缺以及流傳踪緒，很有幫助，而且可以“考其世，知其人”，從中了解著者的籍貫出身，生平遭際，政治見解，學術成就，文章風格以及該書之原委等等，是最有價值的參考資料。

如卷十一鈔本《元秘史》，張氏“解題”云，該書“未經譚潤，故傳本絕稀”，但對太祖、太宗兩朝事跡論次頗詳，“實可羽翼正史，是亦讀《元史》者所不廢也”。“解題”之後又收入錢大昕跋，該跋詳細論證了《元秘史》的價值，指出了《元史》顛倒複沓之弊端。

卷二十一元人鈔本沈仲緯《刑統賦疏》，張氏“解題”又云：“是書取傳《賦》（指傅霖《刑統賦解》，見本書前條）而為之疏，章分句

析，訓釋綦詳。疏文後，每條有‘直解’、‘通例’兩門：‘直解’者，櫟括疏文，以一二語該之也；‘通例’者，則取有元一代斷罪條例以爲之證。可與《大元典章》及《元史·刑法志》相參考。明洪武時，江西蕭岐字尚仁嘗取《刑統賦》引律令爲之解，體例與是書合。今蕭氏之書已佚，而前乎蕭氏者乃巍巍獨存，謂非沈氏之厚幸歟？是書傳本絕稀，自來藏書家無著錄者，此本尚是元人舊鈔，宜珍秘之。”這些提示，對研究元代史的學者，無疑會有事半功倍之效。

又如卷二十九鈔本徐夔《釣磯文集》，張氏“解題”指出，該本缺卷四賦一篇、卷五一卷賦十篇，內“江令歸金陵”等八篇見于《全唐文》，可據以補入，另有“均田賦”、“衡賦”兩篇爲該書所無，而本書中“薦藺相如使秦”等賦共二十一篇又爲《全唐文》失收。“解題”之後，又收入徐夔的族孫徐師仁序及裔孫徐玩序，據此兩序可知，宋建炎以前即有徐夔集行世，以後失傳，此鈔本當係徐玩于元延祐年間所重編。

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中的“解題”，大多類此。至于所錄各書的序引，篇篇都是全文，首尾完俱，一字不改。這些序引的作者，有的是撰著者的後人或門生，有的是撰著者的摯友、同鄉或同僚。他們對撰著者的其人其書，知之既深，言之又詳。所錄序引、題跋，又多是名家所爲。而且，這些文字也有不見于清修《四庫全書》、商務印書館《叢書集成》以及本人專集或題跋專書的情況。有的雖見于上述各書，文字也有不少差異，可供校勘時參考。

如卷二十九唐方干《玄英先生集》收錄明毛晉兩跋，不僅對方干事迹敘述較詳，而且對方干的品評也很有特色。其中有云：

樂安孫郃作《傳》，不若吳融贈詩云：“把筆盡爲詩，何人敵夫子。句滿天下口，名聒天下耳。不識朝，不識市；曠逍遙，閑徙倚。一杯酒，無萬事；一葉舟，無千里。衣裳白雲，坐卧流水；霜落風高忽相憶，惠然見訪留一夕。一夕聽吟十數篇，水

榭林蘿為岑寂；拂旦舍我亦不辭，携筇徑去隨所適。隨所適，無處覓，雲半片，鶴一隻。”宛然畫出元英先生小像。

這兩篇題跋，却不見于《隱湖題跋》（據民國年間丁祖蔭輯《虞山叢刻》），說明《隱湖題跋》尚有遺佚。又如元刊本《朱子成書》有劉將孫序。劉將孫字尚友，是著名學者劉辰翁之子，著作頗豐，其集卻久已亡佚。清修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僅據《永樂大典》所載，輯為《養吾齋集》三十二卷。其中序七卷，題跋二卷，而劉將孫《朱子成書序》卻不曾收入，說明尚有遺佚，據此可補《養吾齋集》之缺。同樣，劉辰翁所作《后山詩注序》，亦不見于《須溪集》。著名學者王應麟的《齊魯韓三家詩考》元刊本，《四庫全書》未收。書中有文及翁序，對三家詩的興廢大略多有考證，足資參考。此序他本未見，殊為可珍。當年，傅增湘先生在編輯《兩宋蜀賢文鈔》時，方憾文及翁之文特為寥落，偶從張氏《藏書志》中獲得此序，大有喜出望外之感（見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卷一“元本齊魯韓三家詩跋考”）。

為了說明序跋的重要性，我們不妨舉例說明。《宣和書譜》一書，歷來不知撰人名氏，相傳以為蔡京、蔡卞、米芾所定。著名藏書家陸心源根據《衍極》卷三“大德壬寅，延陵吳文貴和之，哀集宋宣和間法書文字，始晉終宋，名曰《宣和書譜》二十卷”的記載，認為《宣和書譜》當係吳文貴和之據元時內府所藏及勢家所得成之，而非蔡京、蔡卞、米芾所定。但是，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十七著錄明鈔本《宣和書譜》、《宣和畫譜》各二十卷，卷末有大德壬寅新日長至延陵吳文貴“題識”云：余“暇日博求善本，與雅士參校，十得八九，遂鋟諸梓”，又有大德七年正月錢塘王芝《後序》云，“大德中年，芝被征至京師”，“明年，竣事南歸，適吳君和之刻二《譜》于梓，余嘉其有志于古也，因為書于篇末”。吳文貴的“題識”和王芝的《後序》都明確說明，吳文貴僅僅是搜集各本，梓行刊刻而已。陸心源之

所以犯了草率、武斷的錯誤，就是因為他既沒有見到《宣和書譜》的明鈔本，也沒有見到吳文貴的“題識”和王芝的《後序》（參見中華書局版《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》整理說明）。又如四庫館臣往往說某書“不詳撰者名氏”，其實，這也跟不曾詳考他本著錄，或未見該書序跋有關。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六十三著錄《道南錄》五卷，因所據江蘇採進本佚去序跋，館臣便說不詳撰者。實際上，此書又名《南道書院錄》，其明嘉靖間刻本既有該書撰者金賁亨自序，又有舒春芳、楊應詔二序，如果館臣加以考究，便不至于有此疏漏了。各類版本中的序引、題跋，之所以為學者重視，由此可以想見了。

張金吾很欣賞黃丕烈“讀天下書未遍，不可妄下雌黃”這句話，并把這句話贈給校書者（見本書卷三十四《張來儀先生文集》）。張金吾在本書《例言》中也說，本書“所載序跋，鈔帙居多，輾轉傳寫，類多舛誤。是編所錄，幾無別本可據者，雖顯然謬誤，一仍其舊，不敢以一知半解妄下雌黃”。這種謙慎不苟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書中的許多疏漏，却苦了今天的讀者。上引毛晉《玄英先生集》跋，“何人敵夫子”誤作“何人獻天子”；方干“免闕，晚年遇醫補之”，誤作“遇醫補之”，而卷三十一周紫芝《太倉稊米集》自序“後數年而集亡，當于東家醫甌上求之”，又誤作“當于東家醫甌上求之”；又如《水經注》條，“朱謀瑋”誤作“朱堦瑋”。此外，“萬俟卨”誤作“萬侯高”、“朱子”誤作“宋子”、“張耒”誤作“張來”。“黃帝見大隗乎具茨之山”，“大隗”誤作“大塊”。好在這類錯誤較為明顯，即使徑予改正，也有十分的把握。但是，許多序跋源自寫本或鈔本，其中既有原本字迹潦草，張氏辨認失當之處，又有張氏抄寫或刊刻時產生的疏誤，致使許多文句詰屈聱牙，不知所云。這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大缺憾。不過，這並不影響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的價值。

明代藏書家趙琦美曾把藏書家分爲“藏書者之藏書，讀書者之藏書”，錢曾遂以“讀書者之藏書”自詡。著名學者杭世駿認爲，錢曾不讀經，不讀史，“只可謂藏書家之藏書，非讀書者之藏書也”（見杭世駿《道古堂集》“欣託齋藏書記”）。而黃丕烈在“影宋鈔本《北山小集》跋”中云，“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，收棄秘冊甚多，著有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，于一書之源流纖悉必具”，“此真讀書者之藏書也”（見本書卷三十一）。筆者認爲，藏書者之藏書，注重的是版本價值，偏好於鑒賞；讀書者之藏書，注重的是史料價值，有着更多的考證。二者有同有異。如果這樣理解不錯的話，那麼，把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稱爲讀書者編撰的《藏書志》，應該是最爲貼切的評價。

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的刊本有二：一爲張氏自刻本，內封有費念慈題名，鈐“西蠡”二字篆文印（費氏，江蘇武進人，字屺懷，號西蠡。光緒間進士，官編修。工書，善鑒賞），書前有顧廣圻序、張金吾自序，即中華書局影印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所據之本；一爲清光緒間活字本，有“光緒十三年六月吳縣靈芬閣徐氏用集字版校印”牌記。本書據張氏自刻本整理。

在本書整理過程中，遇到疑問或有缺文時，則找他本查核、補正。重要改動，在腳注中簡要說明；本人不詳者，姑仍其舊，以俟高明。書前重編了目錄，書後附有四角號碼書名索引。爲了簡便，本書名索引，把《藏書志》三十六卷依次編碼；“續志”四卷，分別以37、38、39、40代指。每卷中的條目，也依次編碼排序。如30·12，指卷三十第12條；37·9，指《續志》卷一第9條。依此類推。（本文根據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》2009年第二期《張金吾和“愛日精廬藏書志”》一文改訂）

2009年元月北京

2011年6月改訂

